

# 政治关系、经济权力与贸易往来：来自东亚的证据<sup>\*</sup>

杨攻研 刘洪钟

**【内容提要】** 国家间的政治冲突是否会损害经贸往来这一问题长久以来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作者利用东亚典型国家1980—2013年的季度数据,实证考察了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与经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结论如下:首先,政治关系的恶化将显著降低中国与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但政治关系与贸易之间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强为东亚地区带来了明显的贸易拉动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够对冲政治风险、显著降低双边贸易对于政治冲突的敏感度(偏效应),中国逐渐成为东亚贸易繁荣的稳定器。其次,中国崛起的影响在不同样本组中具有明显的差异,只有在非对抗的国家中,上述贸易拉动效应和对冲政治风险的作用才能显现。最后,政治关系、贸易往来与经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加所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日益提升,但是它对冲政治风险、平稳双边贸易的作用却在不断下降;危机过后的复苏阶段,东亚地区政治关系对于贸易的影响不再显著。

**【关键词】** 政治关系;贸易往来;经济权力;固定效应模型;东亚安全

**【作者简介】** 杨攻研,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经济系讲师;刘洪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 邮编:11003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5)12-0110-21

<sup>\*</sup> 感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转型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项目编号:13JJD810006)、辽宁大学青年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DQN201419)的资助。同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 一 引言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的互动长久以来就是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传统理论通常认为国家间经济依存度的提高有助于抑制战争的发生,<sup>①</sup>“商业的自然结果是带来和平”的观点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sup>②</sup>欧洲大陆成为该理念积极的践行者。然而对于“国家间的政治冲突是否会损害经贸往来”这一逆命题的研究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二战之前有学者提出政治因素和国家权力会在经贸往来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观点,同时也有学者试图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但受到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相关研究未能深入,来自实证领域的证据更为缺乏。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背景之下,政治关系会对经贸往来产生何种影响、国家经济权力又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等一系列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仍未有清晰的结论。

与此同时,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中,东亚经济奇迹一直吸引着世人的目光。然而东亚繁荣的背后始终潜伏着历史原因导致的紧张与不信任,市场力量所推动的经济一体化与各国政治分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由此该地区成为观察政治与经济互动的理想对象。本文试图以东亚国家为样本,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本文改变已有文献中以冲突或负面政治事件作为双边政治关系替代变量的事件研究法,通过引入新的衡量指标以把握政治关系渐变性和连续性的特点,使研究更为符合实际、贴近现实。同时,本文关注到了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权力的此消彼长所带来的不对称依赖这一约束条件,试图阐述当代大国权力转移时期政治

①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he Kantian Peace: The Pacific Benefits of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85-1992,” *World Politics*, Vol.52, No.1, 1999, pp.1-37; Han Dorussen, “Heterogeneous Trade Interests and Conflict What You Trade Matte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0, No.1, 2006, pp.87-107;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Trade Networks and the Kantian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1, 2010, pp.29-42; Erik Gartzke, “The Capitalist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1, No.1, 2007, pp.166-191。

② 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早在1933年凯恩斯就提出自由贸易也许会引发国家关系的紧张和敌对,甚至可能爆发战争,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质疑之声更是日渐增多;菲利普·马丁等人就认为更好的经贸往来也许并不必然带来和平,这最终决定于贸易的地理结构以及双边和多边贸易开放度的平衡。斯蒂法纳迪斯·克里斯的研究向世人展示出贸易的和平促进效应是建立在强有力的制度基础之上的,否则只会导致更多的战争与冲突。菲利普·马丁等人还认为贸易的益处和地缘政治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战争抑或和平。具体参见 Martin Philippe, Thierry Mayer and Mathias Thoenig, “Make Trade Not War?”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75, No.3, 2008, pp.865-900; Stefanadis Chris, “Appropriation,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Vol.2, No.4, 2010, pp.148-172; Martin Philippe, Thierry Mayer and Mathias Thoenig, “The Geography of Conflicts an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4, No.4, 2012, pp.1-35。

与经济互动过程中的特殊性。最后,为避免结论的笼统与含混不清,我们从国家和时间两个维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再次检验前文的结论,清晰地展示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类型中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与经济权力的相互关系。文章结构如下:本文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在回顾既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指出了其贡献与不足;第三部分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实证模型设定,并对所涉及的指标和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阐述模型的实证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对本文的主要发现进行总结。

## 二 相关文献综述

政治因素会对国家间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40 年代。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研究战争前夕纳粹德国的对外贸易时,敏锐地观察到该时期德国的贸易由富裕国家转向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弱小邻国这一违背常理的现象,并试图挖掘背后所隐含的政治考量,<sup>①</sup>结果显示政治因素强有力地影响了纳粹德国的贸易流向。<sup>②</sup> 20 世纪 70 年代中心—外围理论兴起,约翰·加尔顿(Johan Galtung)也指出中心与外围国家间的贸易通常是由二者支配与被支配的政治关系所决定的,<sup>③</sup>形成了对上述思想的重要补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则指出:“各国的政治雄心和角逐确立了市场和经济力量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关系框架。”<sup>④</sup>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相关研究日益丰富起来,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论断进行考察,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领域。

首先,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由于具有紧密的贸易联系和特殊的政治关系,因而成为学者研究政治与贸易相关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亚历山大·耶茨(Alexander J. Yeats)是该领域的先驱,他的研究集中于分析政治对于贸易品价格的影响:利用 1962—1987 年间 20 个原法属殖民地国家作为样本,分析了各国从法国的商品进口价格变化,结果发现相对其他贸易伙伴,这些原殖民地国家支付了更高价格(大约 20%—30%),并且

① 解释如下:德国是大国,在与上述小国进行贸易的时候能够处于主导地位,并提升自身在地缘政治领域的支配能力,但是在与欧美等富裕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却不能带来自身政治影响力的提升。

② Albert O. Hirschman,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

③ Johan Galtung,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8, No.2, 1971, pp.81-117.

④ 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 页。

这一结论对于英国、葡萄牙、比利时等国的原殖民地国家同样成立。<sup>①</sup> 也有学者从贸易量的角度去寻找政治发挥作用的证据, 克里斯·米切纳(Kris Mitchener)和马克·威登密尔(Marc Weidenmier)的研究显示, 同属一个帝国体系的殖民地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是非帝国体系国家间贸易量的两倍, 其根源在于体系内部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宗主国为自身经济利益而推行的促进贸易繁荣的政策。<sup>②</sup> 还有学者从时间的维度分析“独立”这一典型政治事件对于贸易的影响, 如基思·黑德(Keith Head)、蒂里·迈耶(Thierry Mayer)和约翰·里斯(John Ries)的研究显示, 殖民地国家“独立”对于后殖民地时期贸易的影响存在严重滞后性, 短期内影响似乎并不显著, 但是30年之后, 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贸易额累计下降了60%。<sup>③</sup> 上述文献大多通过对殖民地时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的考察, 证实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存在显著非市场化力量的影响, 间接证明了(或推测)政治的重要性, 但上述研究仍然未能对政治因素的影响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

其次, 不少学者专注于从长期历史视角下研究国家间的军事冲突(或战争)这一极端政治事件对于经贸往来的影响, 其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奥马尔·科什克(Omar Keshk)等人以及约翰·奥尼尔(John R. Oneal)等人的研究显示, 军事冲突会对贸易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sup>④</sup> 但这一似乎符合常理的结论遭受了不同学者的质疑, 原因在于上述研究中并未考虑到预期的作用, 如詹姆斯·莫罗(James D. Morrow)认为, 由于“向前看”的经济参与人会预期到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与冲突, 潜在的风险将会促使他们不断调整贸易伙伴与贸易流向, 这就使得战争的最终爆发对于当期贸易的影响微乎其微。<sup>⑤</sup> 但是李泉(Li Quan)和戴维·萨科(David Sacko)进一步指出未被预期到的冲突会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sup>⑥</sup> 此外, 历次战争与冲突在规模与持续

① Alexander J. Yeats, “Do African Countries Pay More for Imports? Yes,”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4, No.1, 1990, pp.1-20.

② Kris Mitchener and Marc Weidenmier, “Trade and Empire,” NBER Working Paper No.230, 2008.

③ Keith Head, Thierry Mayer and John Ries, “The Erosion of Colonial Trade Linkages After Indepen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81, No.1, 2010, pp.1-14.

④ 具体研究可参见 Omar Keshk, Pollins Brian and Rafael Reuveny, “Trade Still Follows the Flag: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in a Simultaneous Model of Interdependence and Armed Conflic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6, No.4, 2004, pp.1155-1179; John R. Oneal, Bruce Russett and Michael Berbaum, “Causes of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85-1992,”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7, No.3, 2003, pp.371-394.

⑤ James D. Morrow, “How Could Trade Affect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6, No.4, 1999, pp.481-489.

⑥ Li Quan and David Sacko, “The (Ir)Relevance of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6, No.1, 2002, pp.11-43.

时间上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约翰·奥尼尔等人看来,这些差异会导致战争对于贸易的冲击也不尽相同,他们的研究表明引发伤亡的军事冲突对贸易的影响更大。<sup>①</sup>凯瑟琳·巴比里(Katherine Barbieri)和杰克·利维(Jack Levy)及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和乔恩·佩弗豪斯(Jon C. Pevehouse)却否定了此结论,他们认为大多数战争对于贸易的影响都不显著,只有在短期内,战争才偶尔会减少交战双方的贸易往来,但是在长期视角下这种负面影响又会消失,甚至战争过后,双方的贸易往来还会有进一步的增进。<sup>②</sup>

随后,此类研究日渐丰富,阿米德·拉曼(Ahmed S. Rahman)通过回顾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这段历史,实证检验了制海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结果显示当其他国家与拥有制海权的国家爆发冲突时,就会显著降低国家间的贸易量,而与其结盟则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积极影响,争夺海上霸权的战争往往会使繁荣的国际贸易终结。<sup>③</sup>查尔斯·安德顿(Charles Anderton)和约翰·卡特(John Carter)及鲁文·格利克(Reuven Glick)和艾伦·泰勒(Alan M. Taylor)实证检验了长期历史中(1870—1997年)战争的贸易代价,发现战争会显著减少双边贸易额,而且这种不利影响会持续多年,该结论与凯瑟琳·巴比里和杰克·利维的研究结论完全相反。<sup>④</sup>此外,他们还发现战争对于贸易的破坏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交战国,即使中立国也会受到显著冲击。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相对较为丰富,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此外,战争冲突的爆发作为一种极端的政治事件,并不能将其等同于政治关系,不能全面衡量政治关系对于国家间经贸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在和平时期,政治关系的冷暖究竟对双边经贸往来意味着什么,从上述文献中我们仍然无从知晓。

最后,除了战争或军事冲突等极端情形外,负面政治事件或政治关系的恶化对于贸易的影响也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之一,同样也是争论的焦点。不少研究显示,政治关系的恶化会对经贸往来带来不利影响,如波林斯·布莱恩(Pollins Brian)发现各国

---

① John R. Oneal, Bruce Russett and Michael Berbaum, "Causes of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885-1992," pp.371-394.

② 具体研究可参见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on C. Pevehouse, "Trade Blocs, Trade Flow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 2000, pp.775-808; Katherine Barbieri and Jack Levy,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The Impact of War on Trad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6, No.4, 1999, pp.463-479.

③ Ahmed S. Rahman, "Fighting the Forces of Gravity: Seapower and Maritime Trade Between the 18th and 20th Centuries,"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Working Paper, 2007.

④ 具体研究参见 Charles Anderton and John Carter, "The Impact of War on Trade: An Interrupted Time-Series Stud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8, No.4, 2001, pp.445-457; Reuven Glick and Alan M. Taylor, "Collateral Damage: Trade Disruption an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War," *MIT Press*, Vol.92, No.1, 2010, pp.102-127.

更愿意与政治关系友好的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贸易联系,<sup>①</sup>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等人以及乔安妮·高娃(Joanne Gowa)和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则指出一国更倾向与盟国(或拥有相同盟国的国家)开展贸易,“贸易追随国旗”仍然是颠扑不破的论断。<sup>②</sup>随后拉菲尔·鲁文尼(Rafael Reuveny)和熙俊康(Heejoon Kang)对此做了进一步补充:政治对抗对国家间可贸易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不对称性,对于某些“战略性”商品的冲击要大于其他商品。<sup>③</sup>但是奥马尔·科什克等否定了上述观点,他们的研究显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sup>④</sup>围绕这一争论,学者们开始以某一特定国家(美国、日本、中国)为研究对象展开了更为广泛的实证检验。

南迪尼·古普塔(Nandini Gupta)和于晓筠(Xiaoyun Yu)的研究结论显示,政治因素是解释美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变量,双边政治关系的恶化将导致美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贸易量的显著下降,作者还进一步以伊拉克战争作为工具变量对此进行验证。<sup>⑤</sup>但这一结论遭到了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L. Davis)和索菲·默尼耶(Sophie Meunier)的反驳,他们将上述研究进行扩展,以美国和日本1990—2004年的数据为例,实证研究发现,负面政治事件并没有损害美国或者日本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了验证该结论的稳定性,他们进一步检验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导致的美法政治僵局、1996年桥本龙太郎(Ryutaro Hashimoto)参拜靖国神社所引发的中日政治紧张事件与美法、中日贸易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政冷经热”乃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常态。<sup>⑥</sup>上述截然相反的结论主要是由研究的时间跨度和政治关系变量指标选取的差别所致。伴随相关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从微观领域寻找新的证据,如萨拉·纽兰(Sara Newland)和克里斯蒂·戈维拉(Kristi

① Pollins Brian, “Does Trade Still Follow the Fla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3, No.2, 1989, pp.465-480.

② 具体研究可参见 James Morrow, Randolph Siverson and Tressa Taberes, “The 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ajor Powers, 1907-199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2, No.3, 1998, pp.649-661; Joanne Gowa and Edward D. Mansfield, “Alliances, Imperfect Markets, and Major-Power Trad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3, 2004, pp.775-805.

③ Rafael Reuveny and Heejoon Kang, “Bilater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Cooperation: Do Goods Matte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5, No.5, 1998, pp.581-602.

④ Omar Keshk, Pollins Brian and Rafael Reuveny, “Trade Still Follows the Flag: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in a Simultaneous Model of Interdependence and Armed Conflic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6, No.4, 2004, pp.1155-1179.

⑤ Nandini Gupta and Xiaoyun Yu, “Does Money Follow the Flag?” Indiana University, Kelley School of Business, Working Paper, 2009.

⑥ Christina L. Davis and Sophie Meunier, “Business as Usual? Economic Responses to Political Tens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5, No.3, 2011, pp.628-646.

Govella)及雷蒙·菲斯曼(Raymond Fisman)、靖滨尾(Yasushi Hamao)和王永祥(Yongxiang Wang)从微观视角入手,对于中日之间所谓的“政冷经热”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不同类型的企业所受到的来自政治领域的冲击存在显著差别。<sup>①</sup>安德烈亚斯·富克斯(Andreas Fuchs)和尼尔斯—亨德里克·克兰(Nils-Hendrik Klann)考察了达赖窜访这一敏感政治事件的经济后果,发现达赖窜访事件的发生会显著降低其窜访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而且该负面效应在2002年至2008年间尤为显著。<sup>②</sup>克里斯蒂娜·戴维斯、安德烈亚斯·富克斯和克里斯蒂娜·约翰逊(Kristina Johnson)进一步指出,相对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进口贸易对于政治关系的变化表现出更强的敏感性。<sup>③</sup>

中国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日之间经济与政治的互动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政冷经热”成为学界共识,刘江永从国际环境及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影响、日本政治右倾化发展与国内力量对比的变化、错误战略思维的误导与国家利益的误判三个方面讨论了中日“政冷经温”的根源,<sup>④</sup>朱峰也从日本国内政治的需要角度对此进行剖析。<sup>⑤</sup>冯昭奎则指出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长期“政冷”正导致“经热”转向“经凉”,中日关系已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sup>⑥</sup>这一论断随后被证实,2010年的“撞船”事件及2012年的恶意“购岛”事件使中日关系跌入谷底,中日关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徐奇渊和陈思翀实证检验了2002—2012年中日之间的政治紧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发现在这10年中,大致经历了“较弱、无影响、显著影响”三个阶段,从“政冷经热”转向了“政冷经冷”。此外,他们还进一步量化分析了中日冲突对双方的损益情况:2012年中国对日本出口潜在损失在313亿至318亿美元,而日本的损失高出中国近20个百分点。<sup>⑦</sup>江瑞平也指出,自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中的政经互动分为“政热经冷”、“政经双热”、“政冷经热”、“政经双冷”几大阶段,并集中分析了当前

① 具体研究可参见 Raymond Fisman, Yasushi Hamao and Yongxiang Wang,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Exchange: Evidence from Shocks to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7, No.9, 2015, pp.2626-2660; Sara Newland and Kristi Govella, “Hot Economics, Cold Politics? Re-examining Economic Linkage and Political Tensions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orking Paper, 2011.

② Andreas Fuchs and Nils-Hendrik Klann, “Paying a Visit: The Dalai Lama Effe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91, No.1, 2013, pp.164-177.

③ Christina L. Davis, Andreas Fuchs and Kristina Johnson, “State Control and the Effects of Foreign Relations on Bilateral Trad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576, 2014.

④ 刘江永:《中日关系“政冷经温”的症结与出路》,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28-30页。

⑤ 朱峰:《日本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强硬》,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第34-36页。

⑥ 冯昭奎:《对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再思考》,载《日本研究》,2006年第2期,第1-9页。

⑦ 徐奇渊、陈思翀:《中日关系紧张对双边经贸的影响》,载《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1期,第1-23页。

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互动显现出来的恶性循环之势的根源与背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努力方向。<sup>①</sup>

综上所述,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从殖民地与宗主国、战争以及负面政治事件三个角度去研究政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但无论从哪个视角考察,至今都无共识达成,且存在若干不足之处。

第一,在大多数研究中,殖民地、战争与负面的政治事件成为两国间政治关系的衡量方式(以其是否发生设定为0或1),采取事件研究法来检验政治关系对于经贸往来的影响,但这种衡量方式存在较大的缺陷:此类事件只是政治关系恶化的极端表现,它并不能分析在战争(或负面政治事件)并未爆发时双边政治关系连续性变化对于经贸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在当今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时代,国家间的冲突往往表现为“斗而不破”,大国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或战争几乎踪迹难寻,双边政治关系的渐进式变化成为常态,由此可知,以往的研究并未恰当地描述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此外,政治关系的变化包括恶化与改善两个维度,二者并非简单的逆过程,当以战争或负面的政治事件作为衡量指标时,仅仅关注到了政治关系恶化的经济后果,对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回暖会对贸易产生何种效应则是被人们完全忽略的一个问题。

第二,基于政治与经济两个变量的线性关系而得出“政冷经热”抑或“政冷经冷”的结论并未考虑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与约束条件,尤其忽略了全球化时代由于国家经济权力的此消彼长所带来的不对称依赖,因此可能掩盖大国权力转移时期更具特殊性的时代特征,<sup>②</sup>不能挖掘故事背后更深层次的逻辑。罗纳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和凯文·鲁尔克(Kevin H. O'Rourke)在研究全球贸易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国家权力和影响力同样不断塑造着国际贸易的结构与形态。<sup>③</sup>在全球化时代,经济与政治相互交织和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经济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权力的基本来源和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④</sup>但国家权力(尤其是经济权力)在以往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中并未被人提及。究其原因,多数的文献以历史上的霸权国家(尤其是美国)或殖民地宗主国为研究对象,对于崛起中的新兴国家关注较少。对于霸权国家而言,相比贸易伙伴,其

① 江瑞平:《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互动:困局与对策》,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5期,第1-18页。

② 具体参考黄琪轩:《大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国际政治后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107-130页。

③ Ronald Findlay and Kevin H. O'Rourke, *Power and Plenty: Trade, 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 马亚华、冯春萍:《空间视角下的东亚权力分布——一种基于引力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第121-134页。

经济权力在短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然而,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我们正在经历着世界经济重心和经济权力的转移。在新兴大国经济不断成长、国家间相对经济权力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它们与伙伴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会展现出何种不同以往的新特征?这一问题至今仍未有学者提及。

第三,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中国的研究日渐增多,相关文献集中于利用时间序列对中日之间的政治僵局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进行探讨,<sup>①</sup>以中国与多个贸易伙伴国为样本,通过面板数据考察它们之间经济与政治互动的一般性规律的研究仍然较少。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基于市场力量的经济一体化不断扩展,中国与东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与此同时,各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也带来了紧张的政治局势和冲突的风险,政治与经济紧密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何种关联,这一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至今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

### 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以中国与东亚国家为样本,实证检验东亚区域内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首先,我们改变前人以事件作为政治关系替代变量的做法,选取新的衡量指标,以中国作为立足点,从总体上把握东亚地区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相关性的一般性规律。其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关注到了中国崛起和经济权力转移这一被人忽略的背景与约束条件,将其纳入模型,考察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强对于上述结论的影响。最后,为避免结论的笼统与含混不清,我们从国家和时间两个维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对前文的结论再次进行印证。

#### (一) 计量模型设定

通常而言,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只有经过长时期才能完全显现,因此本文实证研究过程中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80—2013年,使用比年度数据频率更高的季度数据,样本包括5个具有代表性的东亚国家。<sup>②</sup> 参照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

① 安德烈亚斯·富克斯和尼尔斯-亨德里克·克兰的研究除外。

② 该领域研究的最大限制来自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所使用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所有东亚地区国家选出作为研究对象,共有如下5个: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越南。上述国家囊括了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对于东亚的范围,本文没有以国家的地理位置进行界定。在我国观念中,东南亚和东北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东亚,“东亚共同体”不仅包括东盟、中日韩,也包含印度等国家,因此本文在样本选取时将印度也纳入分析,既扩展了样本,也更具现实意义。

son)以及克里斯蒂娜·戴维斯和索菲·默尼耶等人的研究,<sup>①</sup>基础模型设定如下:

$$Economic\ Flows_{i,t} = \beta_0 + \beta_1 Political\ Relations_{i,t-1} + \beta_2 X_{i,t} + \gamma_i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式 1}$$

其中, $i$ 表示国家, $t$ 表示季度。相比年度数据,使用跨度长达30多年的季度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分析极大扩展了观测值的数量,弥补了因数据库限制而造成的国家数量有限的缺憾;被解释变量  $Economic\ Flows_{i,t}$  表示第  $i$  国在  $t$  时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核心解释变量为  $Political\ Relations_{i,t-1}$ ,即为  $t-1$  时期第  $i$  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为减少模型的内生性,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 $X_{i,t}$  为其他对两国贸易起重要作用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国家  $i$  的人均收入水平、通货膨胀率、汇率水平、国家风险; $\gamma_i$  为与国家有关的不可观测的因素, $\varepsilon_{i,t}$  则表示随机扰动项。

正如前文所述,一方面,政治关系会对国家间贸易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伴随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一国经济权力的增长也逐渐增加其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提高贸易伙伴国对它的依赖度,进而形成除政治关系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贸易的变量。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共同决定着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因此,我们将基础模型进一步扩展,加入中国经济权力( $Economic\ Power_{i,t-1}$ )这一解释变量,以考察它的提升对中国与伙伴国双边贸易额的直接影响。除直接效应之外,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间接效应:伴随经济权力的提升,它会改变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的边际影响,降低经贸往来对于政治关系的敏感度,即相同程度的政治关系的变化(如恶化),也许会造成不同程度贸易额的变化(下降幅度),两国相互依赖度的提升成为政治风险的对冲力量。为此,本文在基础模型中再次引入政治关系与中国经济权力的交叉项( $Political\ Relations_{i,t-1} \times Economic\ Power_{i,t-1}$ ),对上述推断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以考察经济权力发生变化时,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的相关系数的改变。基础模型扩展如下:

$$\begin{aligned} Economic\ Flows_{i,t} = & \beta_0 + \beta_1 Political\ Relations_{i,t-1} + \beta_2 Economic\ Power_{i,t-1} \\ & + \beta_3 Political\ Relations_{i,t-1} \times Economic\ Power_{i,t-1} \quad \text{式 2} \\ & + \beta_4 X_{i,t} + \gamma_i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 (二) 数据与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贸易往来( $Economic\ Flows$ ),即为中国与第  $i$  国之间以美元计价的贸易总额,并将其取对数,该指标的季度数据由月度数据计算得到,所有数据均以中国的统计口径为准(中国对伙伴国的进口额加上出口额),数据源于司尔亚司数据信息有

<sup>①</sup> James Anderson,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9, No.1, 1979, pp.106-116.

限公司(CEIC)的全球数据库。对于核心解释变量(*Political Relations*),本文主要采用清华大学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提供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数据。该数据库采用量化的方式,将1950年以来的中国与多个国家的双边关系用分值表示出来,范围为-9至9,分值越高,则表明两国之间政治关系越良好。与以往研究中使用政治事件或战争作为衡量指标的最大不同在于,该数据库采用将事件分值转化成为关系分值的方法,克服了事件分值等同于国家关系所产生的分值与实际关系不符的缺陷。<sup>①</sup>

对于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学界至今未有明确定义。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提出构成国家权力的因素包括如下方面:地理因素、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情况、人口、民族性格、民族士气、外交的巧拙和政府的英明等,<sup>②</sup>其中与一国经济息息相关的因素(如工业能力)构成了该国经济权力的基础。依据权力最基本的定义,经济权力可理解为国家间政治经济交往与互动过程中,一国运用自身经济实力迫使他国改变意志的能力,<sup>③</sup>它仍然根植于国家间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约翰·惠利(John Whalley)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指出,经济权力与一国经济的相对规模密切相关,它赋予了该国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的能力,以此说服或迫使其他国家按照其意愿行事,这是经济权力最为核心的内容。<sup>④</sup>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同样认为切断某一特定国家进入自己的市场而允许其他国家继续进入,是一种“有力的、在历史上的确是重要的经济权力武器”;<sup>⑤</sup>相反,为了换取对方的妥协或顺从,向其开放自己国内巨大的市场,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影响手段,某国内部的市场越大,该国政府对关闭或开放其市场的自由度越广,那么其潜在的经济权力就越强。综合前人的研究,我们得出结论:经济权力主要来源于一国经济总量和市场的相对规模,因此,对于中国经济权力( $Economic Power_{i,t-1}$ )指标,本文采用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提供的世

① 根据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的使用说明,其基本设想是,双边关系是由众多事件组成的,这些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个“事件流”,对双边关系的衡量需要在事件累积和流动两个维度上同时进行。也就是说,对事件影响力进行累积是我们衡量的起点,测量事件影响力随时间流动的变化是衡量的过程,双边关系现状是衡量的终点。关于该数据库的详细介绍参见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index.html>。

② 具体论述可参见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203页。

③ 马亚华、冯春萍:《空间视角下的东亚权力分布——一种基于引力模型的比较静态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第121-134页。

④ John Whalley, “Shifting Economic Power,” Paper first draft for an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roject on Shifting Global Wealth, September 2009.

⑤ 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EO)。

对于政治关系与贸易往来的关系,我们可以进行初步的描述性分析。如图1所示,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整体而言,政治关系通常与双边贸易额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改善,国家间的贸易额也随之增加;然而,不同的时期,其相关性似乎并不完全相同,尤其是中日之间,周期性特征更为明显。通过图形直接得出这一结论并不完全准确,也许图中所展示出来的关系是伪相关,这里并未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两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稳健性和显著性同样无从知晓,因此需要引入计量模型进行更为细致的实证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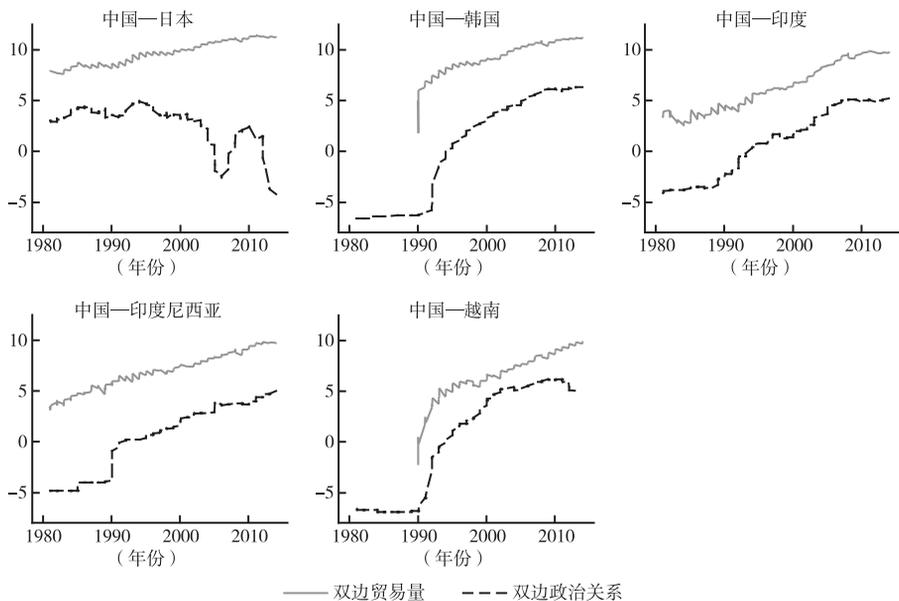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东亚国家间的贸易量及双边政治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和CEIC全球数据库绘制, <http://www.ceicdata.com/zh-hans/products/global>, 登录时间:2015年6月27日。

注:其中横轴为时间,纵轴表示政治关系的数值及双边贸易额的对数值。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引入的控制变量如下:(1)伙伴国在不变价格条件下(2005年价)真实人均收入水平的对数值( $GDP$ ),以此衡量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异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实证检验,在研究贸易相关问题时,该控制变量已为多数学者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2)以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 ),以控制伙伴

国国内宏观经济的波动对于双边贸易的影响,数据同样来源于IMF数据库。(3)剔除价格因素之后,以美元兑本币比价的数值衡量的真实汇率水平(*Exchange Rate*),以反映汇率因素造成的伙伴国商品竞争力的变化带来的进出口变动,数据同样源自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

除了上述相关经济指标之外,伙伴国的国家风险(*Country Risk*)往往也会对国家间贸易产生显著影响,如政府治理能力、治安环境、社会矛盾的激化、潜在内部冲突的可能性等,已经成为跨国企业保持经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与本国的进出口息息相关。我们同样将其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参照全球知名的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ICRG)的定义,国家风险主要包括政府稳定性、社会经济环境、内部冲突、腐败、法律和秩序、种族冲突、民主问责等12个方面,分别对上述领域赋值,各项分值加总之后得到国家风险指标,其数值介于0—100分之间,分值越高,则表明该国的国家风险越小。数据来自ICRG数据库。上述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变量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方差膨胀因子
<i>Economic Flows</i>	602	7.717	2.387	-2.282	11.417	—
<i>Political Relations</i>	660	0.895	4.162	-6.900	15.700	2.11
<i>Economic Power</i>	675	7.524	4.084	2.369	16.324	1.92
<i>GDP</i>	644	26.620	1.650	22.563	29.415	3.66
<i>Country Risk</i>	596	65.396	13.231	34.750	92.750	1.89
<i>Inflation</i>	640	14.948	53.161	-2.164	411.040	1.65
<i>Exchange Rate</i>	660	6.183	2.445	-0.548	9.948	2.67

本文计量模型中包含了多个政治、经济变量,政治与经济之间往往存在着紧密联系,因此也许会导致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的问题,即为多重共线性。这种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会严重影响参数估计并使最终结果产生偏误。为防止这一问题,我们通过计算多个解释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和方差膨胀因子对此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一方面,如果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则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由表1可知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都远小于10,故可以不必过于担忧多重共线性问题。<sup>①</sup>另一方面,解释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公认的判断变量

<sup>①</sup> 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

之间高度相关的标准 0.8,相关性最高的两个变量是汇率水平与人均收入,但也仅为-0.61;同时,从经济学相关基本理论出发,也可以判断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基本判断在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相关回归分析。

表 2 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i>Political Relations</i>	<i>Economic Power</i>	<i>GDP</i>	<i>Country Risk</i>	<i>Inflation</i>	<i>Exchange Rate</i>
<i>Political Relations</i>	1					
<i>Economic Power</i>	0.596	1				
<i>GDP</i>	0.299	0.292	1			
<i>Country Risk</i>	0.441	0.158	0.591	1		
<i>Inflation</i>	-0.277	-0.153	-0.587	-0.488	1	
<i>Exchange Rate</i>	0.208	0.191	-0.620	-0.128	0.366	1

#### 四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实证过程中,本文首先对中国与东亚主要成员国间的政治关系对双边贸易额的影响进行检验,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中国经济权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随后,我们以政治关系的好坏对样本进行分组,以考察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政治关系、双边贸易和国家经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何种差异。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时间跨度长达 30 多年,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关系又是如何演变的。

##### (一) 总体实证结论及分析

在估计过程中,一方面,本文采用混合 OLS 回归对模型进行初步的计量分析;另一方面,为了处理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可能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它可以有效解决未被观察到但同时影响政治关系和经贸往来的某些与国家特征有关的因素所引起的估计偏误。此外,本文还引入时间固定效应,以解决不随国家而变化但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以确保结果为无偏估计。为了使模型中回归系数具有可比性,在所有的计量结果中,回归系数均经过标准化处理。模型 1 和模型 2 的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就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回归方程调整之后的拟合优度均大于 0.9,证明了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以及对现实较强的解释能力。

如表 3 中,列(1)是在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单纯考虑中国—东亚国家

间政治关系(*Political Relations*)与贸易总额(*Economic Flows*)相关性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关系变量的回归系数 $\beta_1$ 为正且高度显著,这说明对于中国而言,在东亚区域内,更为良好的政治关系能够显著促进它与伙伴国的贸易往来,两国关系的恶化则会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支持了“贸易追随国旗”的传统观点。随后,我们将中国经济权力(*Economic Power*)引入模型,以衡量中国崛起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对周边国家所产生的经济向心力及贸易促进效应。从表中列(2)和列(3)可知,在政治关系的回归系数 $\beta_1$ 仍然显著为正的情况下,经济权力变量的回归系数 $\beta_2$ 同样为正,而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中国的崛起和经济权力的增强强有力地拉动了双边贸易的增长,促进了地区贸易的繁荣。

随后,我们引入控制变量,如列(4)至列(6)所示,回归系数 $\beta_1$ 和 $\beta_2$ 的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任何变化,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我们以列(6)的固定效应模型为例对结果进行阐述,整体而言,每当中国与东亚伙伴国的政治关系(分值)改善1%,即可使两国贸易额增加0.176%;而当中国经济权力提升1%,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即可增长0.48%。同时,对于控制变量,其符号也与前人的研究保持了一致:伙伴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国家间贸易额正相关,而伙伴国通货膨胀率的提高会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增强,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利影响;伙伴国本币贬值对于它与中国间总贸易额的影响似乎并无确定的结论,尤其是在引入了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之后,汇率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显著降低,究其原因,伙伴国汇率的贬值一方面减少本币购买力,降低中国对它的商品出口,另一方面,伙伴国商品竞争能力的增强使中国对其商品的进口增加,汇率对双边贸易最终的影响则取决于两国消费者的需求弹性及贸易结构,因此上述结论的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对于国家风险,与常理相符,伙伴国的国家风险越低,则越能促进它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但是,伴随中国的崛起和区域内经济权力的转移,上述中国与东亚成员国之间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的关系会受到何种影响则是鲜被提及的话题。对此,我们通过引入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经济权力的交叉项(*Political Relations*×*Economic Power*)对此进行检验。式2的两边对政治关系求偏导数即可得到双边贸易额对两国政治关系的偏效应,其经济含义为:伴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化,两国间的贸易额会发生何种改变。如式3所示:

$$\frac{\partial \text{Economic Flows}_{i,t}}{\partial \text{Political Relations}_{i,t-1}} = \beta_1 + \beta_3 \text{Economic Power}_{i,t-1} \quad \text{式 3}$$

由表3中的列(7)和列(8)可知,无论混合OLS估计抑或是固定效应模型,交叉项

的系数  $\beta_3$  均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此同时,政治关系的系数  $\beta_1$  仍然显著为正。将上述系数代入式 3, 得出:

$$\frac{\partial \text{Economic Flows}_{i,t}}{\partial \text{Political Relations}_{i,t-1}} = 0.322 - 0.179 \text{Economic Power}_{i,t-1} \quad \text{式 4}$$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恶化会显著损害双边贸易往来,然而伴随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区域内经济影响力的日渐增加(即  $\text{Economic Power}_{i,t-1}$  的增加),双边贸易额对于政治关系的偏效应逐渐减少,政治关系的恶化对于贸易往来的负面效应也逐渐降低。中国经济权力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会使贸易往来对政治关系的偏效应下降 0.179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强能够对冲政治风险,降低经贸往来对于政治关系恶化的敏感性。

表 3 政治关系、双边贸易额与经济权力的整体回归结果(1980—2014 年)

	(1)	(2)	(3)	(4)	(5)	(6)	(7)	(8)	(9)
<i>Political Relations</i>	0.268 *** (0.013)	0.425 *** (0.32)	0.268 *** (0.013)	0.098 *** (0.014)	0.189 *** (0.024)	0.176 *** (0.019)	0.178 *** (0.030)	0.445 *** (0.046)	0.322 *** (0.044)
<i>Economic Power</i>		0.461 *** (0.024)	0.509 *** (0.029)	0.330 *** (0.007)	0.417 *** (0.017)	0.482 *** (0.039)	0.370 *** (0.010)	0.486 *** (0.019)	0.480 *** (0.037)
<i>GDP</i>				0.720 *** (0.032)	0.408 *** (0.123)	0.416 *** (0.126)	0.706 *** (0.031)	0.559 *** (0.121)	0.528 *** (0.144)
<i>Country Risk</i>				0.164 *** (0.149)	0.120 *** (0.168)	0.032 (0.243)	0.149 *** (0.159)	0.055 *** (0.161)	0.001 (0.288)
<i>Inflation</i>				-0.050 ** (0.005)	-0.044 ** (0.004)	-0.057 *** (0.005)	-0.052 ** (0.005)	-0.023 (0.004)	-0.043 ** (0.004)
<i>Exchange Rate</i>				0.371 *** (0.020)	0.161 * (0.088)	0.048 (0.081)	0.366 *** (0.019)	-0.098 (0.106)	-0.052 (0.093)
<i>Political Relations</i> × <i>Economic Power</i>							-0.104 *** (0.003)	-0.308 *** (0.004)	-0.179 *** (0.004)
<i>Country Fixed-effect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 Fixed-effects</i>	Yes		Yes			Yes			Yes
<i>Hausman test</i>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No. of observations</i>	589	589	589	551	551	551	551	551	551
<i>Adj. R-squared</i>	0.960	0.629	0.953	0.940	0.948	0.956	0.941	0.954	0.958

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t$  统计值,\*\*\*、\*\*、\*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究其原因,一方面,伴随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日渐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能够形成对伙伴国商品的巨大需求,增加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同时,伴随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攀升,产品竞争力同样不断提高,出口也随之增加。中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融合和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经济权力形成了对其他国家强有力的制衡,当历史遗留问题或领土争端引发关系紧张时,作为理性的政治家势必确保政治纠纷对贸易的冲击降至最低。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极大改变了东亚地区原有的分工模式,中国正在取代日本在东亚生产链中的核心地位,日益成为连接东亚和欧美市场的纽带:东亚其他经济体对欧美市场的直接出口正在逐渐减少,而是通过对中国出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在中国完成最后一道组装工序之后输往最终消费地。这即为人们所熟悉的“新三角贸易”。中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特殊地位虽然不能够因此而规避与周边国家的纠纷,但却与东亚成员国形成了生产链共同体,有效防止了政治僵局向经济领域的蔓延。

## (二) 基于细分样本组的实证分析

在上述研究中,实证结果支持了“政冷经冷”的结论,同时也发现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强会显著降低贸易对于政治紧张的敏感性(或紧张的政治关系对于双边贸易的冲击),但是该结论是否同样存在前提条件,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友好型及对抗型),经济权力所扮演的角色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前文中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了使结论更为清晰和严谨,我们需要做更为细致的分析。

根据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中的定义,双边政治关系(*Political Relations*)被精确界定为“对抗”(-9至-6)、“紧张”(-6至-3)、“不和”(-3至0)、“普通”(0至3)、“良好”(3至6)、“友好”(6至9)六个等级,我们以0为临界点将样本分为两组:政治关系小于0的样本组A(*Poor Relations*),包括紧张、不和、普通三种类型;政治关系大于0的样本组B(*Good Relations*),包括普通、良好、友好三种类型。笔者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回归,以检验中国经济权力的变化在不同的样本组有何差异。

结果如表4所示,对于两个样本组,我们仍然先单独观察单变量回归的情形,随后再将控制变量加入模型。对于B组,政治关系和经济权力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显著性达到了1%,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负,与前文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但对于A组则不然,结果如列(1)至列(3)所示,政治关系变量均显著为正,这与前文中所得出的结论保持了一致;然而,对于中国经济权力的回归系数,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它均不显著,而且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中[列(1)、列(2)]尽管符号为负,也同样变得不再显著。

表4 基于细分样本组的检验

	(1)	(2)	(3)	(4)	(5)	(6)
	A组(Poor Relations)			B组(Good Relations)		
<i>Political Relations</i>	0.480 <sup>***</sup> (0.155)	0.269 <sup>*</sup> (0.164)	0.199 <sup>**</sup> (0.138)	0.355 <sup>***</sup> (0.031)	0.143 <sup>***</sup> (0.041)	0.346 <sup>***</sup> (0.038)
<i>Economic Power</i>	-0.039 (0.105)	0.032 (0.097)	-0.028 (0.109)	0.847 <sup>***</sup> (0.012)	0.520 <sup>***</sup> (0.019)	0.686 <sup>***</sup> (0.016)
<i>Political Relations</i> × <i>Economic Power</i>	-0.232 <sup>**</sup> (0.018)	-0.117 (0.019)	-0.113 (0.020)	-0.296 <sup>***</sup> (0.003)	-0.094 (0.004)	-0.367 <sup>***</sup> (0.004)
<i>GDP</i>		1.006 <sup>***</sup> (0.141)	1.524 <sup>***</sup> (0.547)		0.857 <sup>***</sup> (0.025)	0.639 <sup>***</sup> (0.073)
<i>Country Risk</i>		0.015 (0.162)	0.089 <sup>*</sup> (0.454)		0.233 <sup>***</sup> (0.157)	0.034 <sup>*</sup> (0.173)
<i>Inflation</i>		-0.040 (0.009)	-0.013 (0.008)		0.020 (0.003)	0.052 <sup>***</sup> (0.002)
<i>Exchange Rate</i>		0.618 <sup>***</sup> (0.044)	0.817 <sup>***</sup> (0.348)		0.385 <sup>***</sup> (0.016)	-0.157 <sup>*</sup> (0.067)
<i>Country Fixed-effects</i>	Yes		Yes	Yes		Yes
<i>Hausman test</i>	0.090		0.003	0.060		0.000
<i>No. of observations</i>	146	123	123	443	428	428
<i>Adj. R-squared</i>	0.935	0.946	0.653	0.951	0.929	0.938

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t$ 统计值,\*\*\*、\*\*、\*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该结论说明,在东亚地区,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在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抑或是存在外交纠纷的国家,国家间政治关系的趋冷均会对两国的贸易往来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中国经济权力的提升所带来的贸易拉动效应并非普遍现象,而是仅仅存在于与中国保持了良好政治关系的伙伴国(政治关系大于0);同时,只有在关系良好的伙伴国,中国经济权力的日渐增长才能降低经贸往来对于政治关系波动的敏感度。这一结论反映出周边国家对待中国崛起的矛盾心态,友好型国家将这视为难得机遇,切实利用中国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搭乘中国崛起的顺风车,促进地区贸易的繁荣并从中获益,而心怀芥蒂的国家则往往对此表示担忧,国内日益显露出经济民族主义倾向,进而造成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强并未成为两国经贸往来的“压舱石”,甚至成为其国内政治家赢得选举的工具,最终不利于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 (三) 基于不同时间段的考察

由于我们所考察的时间跨度长达30年,在这段时期中,世界见证了东亚奇迹的发

生和日益紧密的经济融合,同时东亚区域内中国的角色也在日益发生变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伴随“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经济的起飞,该地区形成了广为人知的“雁行模式”。日本作为该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在地区经济事务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受制于外部不利的国际环境与相对有限的经济实力,中国尚不能在东亚地区经济秩序的构建中发挥重要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处于市场驱动阶段。<sup>①</sup>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的根本性转变,即从以双边外交为中心,开始转变为以多边集体主义外交为中心,<sup>②</sup>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并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地区经济融合的驱动力,中国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与各国的经济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开始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核心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塑造东亚格局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欧美在债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复苏步履蹒跚,日本长期停滞的经济在危机之下更显疲软,然而危机之中的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8.7%的高速增长,扛起了引领东亚乃至世界走出低谷的重任,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上述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中,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的相关性又各具何种特征成为我们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再次以1997年第一季度和2008年第二季度两次危机爆发的时间作为分界点,对样本进行分时间段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列(1)至列(2)和列(3)至列(4)分别是1981年第一季度到1997年第一季度及1997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的回归结果,我们以列(2)和列(4)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为例进行分析。

从定性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两个时期中,中国—东亚成员国间政治关系与贸易之间正相关的关系仍然成立,显著水平达到1%,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有助于推动双边贸易额的增长。同时,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降低了贸易往来对于政治关系变动的偏效应(或敏感性),平滑双边贸易波动。但从定量的角度而言,这两个时期同样存在着差异:相比第一时期,在第二时期中,中国经济权力增长所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更大(系数由0.230变为0.468),但是,交叉项的系数则由-0.563变为-0.396,这意味着经济权力对于化解双边关系紧张所带来的负面冲击的作用开始下降。导致该结论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伴随中国日益成为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在东亚分工体系中日渐重要的地位,东亚各国对于中国经济层面的依赖日益增加,因此进出口不断攀升;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传统地缘政治均势的

① 门洪华:《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2期,第16-25页。

② 赵宏伟:《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中日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9期,第19-39页。

变化,各国对于中国的防范之心也日渐加重,“中国威胁论”时常出现在各国的学术及政策讨论中。中国崛起不再被各国看作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难得机遇,当外交纠纷出现时,市场力量所推动的紧密的经贸关系成为本国经济民族主义者煽动民众情绪的理由,微小的政治争端即可造成贸易额短期内的急剧下滑,经济层面的吸引力对于缓解政治摩擦的效果由此逐渐下降。

表5 细分时间段的检验

	(1)	(2)	(3)	(4)	(5)	(6)
	1981Q1-1997Q1		1997Q2-2008Q2		2008Q3-2013Q4	
<i>Political Relations</i>	0.500 *** (0.0717)	0.625 *** (0.0792)	0.091 (0.1085)	0.423 *** (0.0649)	0.128 (0.2028)	0.125 (0.1002)
<i>Economic Power</i>	0.179 *** (0.0499)	0.230 *** (0.1137)	0.200 *** (0.0381)	0.468 *** (0.0378)	0.464 *** (0.0581)	0.113 ** (0.0504)
<i>Political Relations</i> × <i>Economic Power</i>	-0.403 *** (0.017)	-0.563 *** (0.0188)	-0.026 (0.0103)	-0.396 *** (0.0066)	0.117 (0.0131)	-0.244 (0.0059)
<i>GDP</i>	0.894 *** (0.0479)	0.990 *** (0.0598)	1.054 *** (0.0339)	0.638 *** (0.1359)	0.839 *** (0.0737)	2.326 *** (0.3219)
<i>Country Risk</i>	0.034 (0.2367)	-0.044 (0.3077)	0.257 *** (0.1855)	-0.024 (0.2763)	0.696 *** (0.2683)	-0.208 (0.9113)
<i>Inflation</i>	-0.160 *** (0.0048)	-0.148 *** (0.0052)	0.026 (0.0024)	0.051 *** (0.0016)	0.041 (0.0103)	0.011 (0.0056)
<i>Exchange Rate</i>	0.530 *** (0.0274)	0.578 *** (0.0292)	0.488 *** (0.0189)	-0.085 (0.1926)	0.291 *** (0.0239)	0.161 (0.2417)
<i>Country Fixed-effects</i>		Yes		Yes		Yes
<i>Hausman test</i>		0.000		0.000		0.000
<i>No. of observations</i>	231	231	220	220	100	100
<i>Adj. R-squared</i>	0.931	0.941	0.943	0.973	0.917	0.990

注:括号内为参数估计的  $t$  统计值,\*\*\*、\*\*、\*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至 2013 年第四季度,全球经济及东亚地区经济均处于缓慢复苏阶段。由列(5)和列(6)可知,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相比危机之前最为显著的变化即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之间的相关性不再显著。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成为支撑东亚复苏的关键,它轻巧地打开了经济增长的阀门并成为亚洲最强劲的增长引擎。欧美需求的不振与中国消费者强大的购买力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成为最终市场的提供者和各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危机后的艰难复苏时期,各国领导者确

保国家间的政治紧张气氛独立于经贸往来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值得说明的是,这一结论的出现不能排除是因所考察的时间段较短(仅为17个季度)所致,我们也推测这仅仅是短期现象,伴随东亚和全球经济走出危机,二者之间也许仍然会回到负相关的常态之下。

## 五 结论

本文以中国为立足点,利用东亚典型国家1980—2013年的季度数据,实证考察了政治关系、经贸往来与经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就整体而言,中国—东亚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政治关系的紧张将显著降低国家间的双边贸易额,支持了传统的“贸易追随国旗”的观点。但与前人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关注了中国崛起、东亚正在持续发生经济权力转移这一宏观背景与约束条件,结果显示政治与经贸之间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中国经济权力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伴随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带来了明显的贸易拉动效应,促进了国家间贸易额的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双边贸易额对于政治冲突的敏感度(偏效应)随之下降,中国的崛起提高了东亚地区经济的相互融合与依赖,并逐渐成为东亚贸易繁荣的稳定器。

通过细分样本的进一步考察,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贸易拉动效应在不同的样本组中显出明显的差异,只有在政治关系大于0的国家中,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才会对贸易带来积极的影响,并且也只有在这些国家中,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才能在政治僵局出现时起到贸易稳定器的作用。由此可见,在东亚区域内紧张的政治氛围制约了中国经济对区域经济的积极贡献。最后我们还将研究细分为不同的时期,政治关系、双边贸易与经济权力之间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权力的增加所带来的贸易促进效应日益提升,可是它对冲政治风险、平稳双边贸易的作用却在不断下降。危机过后的复苏阶段,东亚地区政治关系对于贸易的影响不再显著。

当前,东亚地区市场力量所推动的经济一体化与各国政治分裂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冲突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切实改善各国的政治关系,打破国家间的紧张与不信任感,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中国崛起与全球经济权力的转移,才能充分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还世界以持续繁荣与稳定的东亚。

(截稿:2015年11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